

乾隆中期和道光中后期债务命案研究

林 展 陈志武 彭凯翔

〔摘要〕 利用 1766 至 1775 年、1836 至 1845 年这 20 年间 12163 件刑科题本债务命案，考察以命案结束的借贷交易在契约订立和执行方面的特征，发现在契约订立方面，这些借贷交易以口头约定为主，大部分借贷的借款额小，零利率多，很少有抵押或担保，借期短且常常不明确；而在契约执行方面，则以贷方自己执行债权为主，保人参与调解或通过诉讼解决的交易很少。这些借贷交易表现出明显的模糊性特征，通过列举若干案例，发现这一特征是引发命案的重要诱因。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 8587 (2016) - 02 - 0000 - 00

一、问题与史料

民间借贷是传统社会人们应对生存风险和进行投资的重要手段，一直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①不过，已有研究更多集中在契约订立这一部分，很少涉及到契约执行。一笔完整的借贷交易包括契约订立和执行两部分。研究者之所以对前者关注较多，主要是其所依据的大多是文书、账簿等资料，这些史料很少记载契约执行的信息。这使得已有研究缺少对大量没有订立书面契约的借贷交易的关注，更缺少对契约执行过程的详细讨论，因此，其对整个民间借贷活动的分析并不完整。

少数关于契约执行的研究，主要来自于法律史学者，他们基于诉讼档案和社会调查，对借贷交易引发纠纷的案件进行了分析，这些研究将对借贷合约的分析从书面契约扩展到了口头合约，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契约执行的信息，但由于现存的诉讼档案主要分布在少数几个地域^②，且其中涉及到债务的案件数量并不多，难以为我们理解更广地域和更长时间范围的契约执行提供参考。

本文的立意之一在于，利用清代刑科题本中的债务命案，同时分析债务契约订立和执行问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 林展（1984 - ），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后，北京 100872，zhan. lin@ruc. edu. cn，陈志武（1962—），男，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北京 100872，zhiwu. chen@yale. edu。彭凯翔（1978—），男，河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开封 475004，kaixiangp@qq. com。

① 可参阅方行：《清代前期农村高利贷资本问题》，《经济研究》1984 第四期；王天奖：《近代河南农村的高利贷》，《近代史研究》1995 第 2 期，第 34—53 页；刘秋根：《明清高利贷资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
② 比如巴县、南部县、新竹县等。

题，通过与已有基于诉讼档案的研究相对比，为更好地认识清代民间借贷中的契约执行以及整个借贷活动提供参考。

刑科题本债务命案是研究契约执行的上佳史料，因为这些债务交易最后都以命案结束，包含了整个借贷交易的过程，特别是借贷双方在契约执行过程中的交涉、纠纷与冲突，这些信息在契约文书等史料中几乎不存在。而相对于地方司法档案，刑科题本样本量大，时间跨度长，地域空间广，具有系统性、全面性，能够避免使用极端个例进行论证的选择性偏差。除此之外，刑科题本经过严格的司法程序而保留下来，内容相对可靠，其价值得到众多学者肯定。^①

当然，也正是由于债务类刑科题本以命案结束，不能将其作为反映整个民间借贷执行情况的代表，特别是不能等同于那些正常完成的借贷交易。这些交易，由于没有产生命案，都没有被记录下来。但由于本文使用的命案基本上都是过失杀人，且数量众多，其中的信息仍然能够为理解民间借贷执行问题提供参考。特别是有助于我们理解契约执行为什么会以“命案”这一对借贷双方都不利的失败方式来结束。

与本研究相关的另外一个研究主题是暴力和命案，这一主题正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②，因为暴力和命案的数量可以作为衡量人类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书中，通过对人类社会各种暴力现象历史变动趋势的精彩分析，斯蒂芬·平克认为，“纵观历史长河，暴力呈现下降趋势”，“可谓人类历史最重大之事。”^③ 该书论证精彩纷呈，但关于中国的部分却涉及较少。

由于债务纠纷是导致这些命案的直接原因，因此，对刑科题本债务命案的研究，除了能够提供大量关于契约执行的信息外，还有助于我们理解暴力和命案产生的原因。另外，债务命案数量众多，在整个命案中占比高，因而对其研究也更有价值。^④

实际上，对中国传统社会暴力现象的研究已开始多年，比较系统的成果是步德茂的《过失杀人、市场与道德经济》^⑤ 一书，该书同样以刑科题本为主要史料，认为在 18 世纪的清代中国，商品化过程的加速以及人口的增长，导致了与土地产权相关的纠纷和命案的增加。这一著作为理解清代的土地交易及相关的命案变化提供了很多洞见，不过，作者分析的样本数量非常有限，且几乎没有涉及数量众多的债务命案。

关于清代命案的最新研究，来自于陈志武等学者，他们通过系统地整理刑科题本、红本、黄册等资料，对清代命案率的变化做了更为详细的分析。只是，他们的分析主要是讨论命案的整体变化趋势及对这一趋势进行解释，其分析的视角较为宏观，而没有集中到某一特定的案件类型进

① 冯尔康：《论“一史馆”土地债务类档案的史料价值》，《南开学报》1999 年第 4 期，第 15—18 页。陈志武、林展、彭凯翔：《民间借贷中的暴力冲突：清代债务命案研究》，《经济研究》2014 年第 9 期，第 168 页。关于刑科题本档案的详细介绍可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概述》，档案出版社，1985 年；倪道善：《明清档案概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 年；步德茂：《过失杀人、市场与道德经济：18 世纪中国财产权的暴力纠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年。

② 诺斯、瓦利斯、温格斯特著，杭行、王亮译：《暴力与社会秩序——诠释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格式出版社，2013。斯蒂芬·平克，安雯译：《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下降》，中信出版社，2015 年，第 1 页。

③ 斯蒂芬·平克，安雯译：《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下降》，第 1 页。

④ 在本文考察的时段，债务命案数量占题本的数量为 43%，占总体命案的数量应该更高，因为题本数量会多于命案数量，这主要是因为对于同一件命案，题本中有督抚等呈报的“通本”和刑部等呈报的“部本”，两者实际记录的是同一案件。

⑤ 步德茂：《过失杀人、市场与道德经济：18 世纪中国财产权的暴力纠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年。

行微观层面的分析。^① 对于债务命案这一特定的命案类型，学界还很少有详细的讨论。^②

本文的立意之二在于，通过对命案中的借贷交易活动进行考察，寻找引发命案冲突的诱因，受资料与篇幅所限，在本文中，我们集中从契约模糊性这一角度，分析其如何引发纠纷和命案。^③

就史料而言，这里使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且已开放利用的清代内阁刑科题本，这些题本被分为“土地债务”和“婚姻奸情”两类^④，覆盖的时期大致从1732年至1901年，内容一般是严重的刑事案件，在“土地债务类”中则几乎都是命案。土地债务类题本的案由分两种情况，一是土地类，包括土地和房屋的买卖、典当、租佃以及与此相关的交易，具体可以参看步德茂的讨论^⑤，另一种是债务类，包括借贷或赊欠。^⑥ 基于这里的写作目的，我们将样本范围限定在“土地债务类”中的债务类题本上。

由于刑科题本的数量巨大，我们研究团队带领助研阅读了1766至1775年（乾隆31至40年）、1836至1845年（道光16至25年）这两个时期全部的土地债务类题本，这些题本共计27662件，我们对其中所有涉及到借贷交易的题本进行阅读和建立数据库，共得到12163个样本。之所以选择这两个时期，一是由于这两段时期的题本保存相对比较完整，二是希望选择的样本能够分别代表清代相对繁荣和相对萧条的两个不同的阶段。^⑦

这里讨论的债务命案基本上发生在“素识无嫌”、“熟识没仇”的熟人之间。为了对刑科题本债务命案有一个直观的了解，下面分别从乾隆10年和道光10年^⑧这两个所讨论的时段各选取一个案例。案例1：赵登虎系赵兴林无服族侄。乾隆三十五年八月间，赵兴林曾借赵登虎钱一千文，还过钱九百文。尚欠本利钱三百有零未楚。（乾隆）三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赵兴林与母刘氏在地收割芝麻。赵登虎走至，欲将赵兴林猪只牵回抵算。刘氏夺阻不下，赵兴林上前拔出身佩小刀下抵。……。赵兴林复用刀向下一戳。不期失足跌去势重，以致戳伤赵登虎左腿，透过前面，移时殒命。^⑨

案例2：据（借方，凶犯）邓洪兴供，宜宝县人，年三十一岁，……，于陈老七并他妻弟杨三儿常帮上水船拉帘，熟识没讐，道光十四年二月间，小的借用陈老七钱二百文，五月初五日，母舅廖长生在场还清，陈老七要小的认给利钱二百文，小的央恳情让，陈老七应允，各散。六月间，小的到桂轮场赶集，会遇陈老七，说他没钱使用，仍要利钱，小的因前已央恳，斥他不应再索，陈老七不依，来剥取衣服作抵，……，是杨三儿上前劝散，……。十一月间，……，小的想

① 陈志武、彭凯翔、朱礼军：《清代中国的量化评估—从命案发生率看社会变迁史》，载陈志武、龙登高、马德斌主编：《量化历史研究（第一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

② 笔者目前所见，只有陈志武、林展、彭凯翔：《民间借贷中的暴力冲突：清代债务命案研究》一文。

③ 与步德茂强调的产权不明晰不同，借贷交易中的命案很少涉及到初始产权的界定问题，更多地是涉及到交易的执行即交易成本的问题。当然，产权界定与契约执行都是属于交易成本的范畴。

④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人员介绍，未开放的刑科题本约有30.7万件，但主要是“土地债务”和“婚姻奸情”这两类之外的命案。“婚姻奸情”类也会涉及到少量与借贷交易相关的命案。

⑤ 步德茂：《过失杀人、市场与道德经济：18世纪中国财产权的暴力纠纷》。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概述》，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115—116页。

⑦ 为了通读整理这20年的借贷题本，我们的10位助研共花了7个月。如果要通读所有年份的借贷题本，则需要花许多年时间，因此我们只好选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20年。

⑧ 为表述方便，本文的乾隆10年是指乾隆31至40年这10年时间，道光10年是指道光16至25年这10年时间。

⑨ 档案号：02—01—07—06765—005，题名“题为审理南部县民赵兴林因被拉猪抵欠争闹伤毙赵登虎一案依律拟绞监候请旨事”，具题日期：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初六日。由于刑科题本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下面引用的案例，删除了打斗过程以及重复的供词，且补充了凶手住址的省和府，其他信息未做改动。案例省略的文字，用省略号替代，括号中的说明文字为笔者所加。

起前被陈老七剥衣殴辱，忿不过，起意把他殴打出气，……，陈老七情急向前奔逃，闪跌岸下河内。……，陈老七当即沉溺身死。^①

文章余下部分组织如下，首先是对收集到的所有债务题本信息进行量化分析，分别从契约订立和契约执行的角度，寻找在大样本层面，这些命案中借贷交易所具有的特征。其次是选择契约模糊性这一视角，通过提供关于债务契约存在的各种模糊性的案例，讨论其对借贷纠纷及命案的影响。最后是得出一个初步的总结。

二、刑科题本中债务命案的基本特征

清代刑科题本债务命案数量巨大，如果只是基于对少数案例进行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可能会很不完整。我们尝试从宏观的角度，分析收集到的 12163 件借贷交易命案，分别从借贷交易的订立和执行两个方面来进行讨论。^② 虽然我们尽可能将题本中的债务交易信息收集完整，但由于题本本身的记录详略差异以及档案本身的残缺，还是有很多交易信息不太清楚，因此，下面的统计分析同时列出信息明确部分的特征和信息不明确命案的数量。对于那些信息不明确的样本，我们也根据相关的信息对其特征进行一些推测。

首先分析借贷交易合约订立这一部分，对于一笔借贷交易，我们一般考虑下面这些合约条款，该笔借贷中借方向贷方借了多少钱（即本金是多少）、借钱的利息是多少、是否有书面契约、是否有抵押品、什么时候归还（即借期）？下面对这些合约条款逐一进行统计分析和讨论。

根据表 1，在明确知道本金数量的 11202 笔交易中，本金的范围从 0.0007 两白银（1 文钱）到 6574.4 两白银^③，整个样本本金的平均值是 5 两白银^④，而中位数只有 0.58 两^⑤，即有 50% 的借贷交易，本金是在 0.58 两白银以下。在 75% 的分位数，也只有 2.1 两白银，即有 75% 的借贷，本金的金额在 2.1 两白银以下。这表明，对这里考察的债务命案而言，绝大多数的借贷交易中，借贷的金额都是非常小的。

就利率而言，信息明确的样本数量为 3837 个，我们将所有的利率都统一换算为年化利率，即一年的借贷利率是百分之多少。利率的信息，相对于本金要更为复杂，因为存在争利的情况，即借贷双方在一些情况下，在达成借贷交易的时候，没有对利息做出明确的约定，当契约执行时，双方对利率产生了争执。^⑥ 这时，就会存在一个借方愿意支付的较低利率和贷方希望收取的较高利率。在表 1 的统计分析中，对于争利的情况，我们取两者的平均值。从表 1 可知，年利率

① 档案号：02-01-07-11206-015，题名“题为会审四川南溪县客民邓洪兴等因债务纠纷伤毙陈老七一案依律分别定拟请旨事”，具题日期：道光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② 陈志武等最新的工作论文对土地债务类、婚姻奸情类命案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变化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③ 我们根据银钱比价将本金全部换算为白银，换算的依据是根据《清代以来的粮价：历史学的解释与再解释》（彭凯翔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年。）一书中提供的银钱比价序列，将样本分为南方和北方两部分，分别使用江南和华北的银钱比价，将铜钱换算为白银。还有 7.9% 的样本，借贷本金是粮食、实物等，由于价格信息不明确，没有进行换算。

④ 根据“大清律例”对欠债不还者的惩罚规定，“兼庶民、官吏言。其负欠私债，违约不还者，五两以上，违三月，笞一十；每一月，加一等，罪止笞四十。五十两以上，违三月，笞二十；每一月，加一等，罪止笞五十。”5 两白银正好是法律对借方欠债不还进行惩罚的起步金额。

⑤ 中位数是将所有的观测值按照从小到大排列，取正中间的那个数，若中间的数是两个，则取二者的算术平均值。而 75% 分位数，则是取排在第 75% 位置上面的那个数，在样本数值变动幅度较大且存在一些极端值时，中位数比均值能更好地反映样本的集中程度。

⑥ 在包含利息信息的样本中，对利息产生争执的样本数量为 94 个。

的均值为 8.5%，这一数值远低于《大清律例》规定的三分月息（年息 36%）^①，而利息的中位数则是 0，这表明有大量的零利率存在^②。实际上，零利率在 3837 个样本中的比例为 3418 笔，占到 89.1%。而在总样本中，还有 8326 笔不能明确知道利率是多少。我们推断这些不明确的样本应该是以零利率为主。原因一是借贷交易纠纷常常是因为利息纠纷而起，而根据《大清律例》关于“违禁取利”的法律规定，利率事关司法裁决（因此，借贷发生时倾向于把利息定得尽可能低甚至为零，之后又会因为对当初利息说法不同而争执），因此，如果题本中没有提到利率，是零利率的可能性应该比是正利率更高。二是这些样本中，赊欠的交易有 4435 笔，这一般是买肉、酒等小额的短期赊欠，利率通常是零。表 1 对不包括赊欠的借贷和赊欠这两个子样本分别进行了统计，发现在赊欠情况下，本金明显更小，利率更低，且几乎都为零利率。

表 1 本金和利率的描述统计

变量名称	观测值	中位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本金（银两）	11202	0.58	5	69.3	0.0007	6574.4
利率（%）	3837	0	8.5	111.6	0	4500
子样本 1（不包括赊欠）						
本金（银两）	7076	0.7	4.7	45.7	0.0007	2000
利率（%）	2700	0	11.7	132.8	0	4500
子样本 2（赊欠）						
本金（银两）	4126	0.36	5.5	107.4	0.001	6574.4
利率（%）	1137	0	0.9	9	0	200

在契约的类型方面，我们关注借贷交易是基于口头约定还是书面契约，通过统计，我们发现样本中口头合约较多，如表 2 所示，在 12163 笔交易中，明确记录有书面合约的借贷交易一共是 364 笔，占总样本的 3%，与此相对应，明确为口头合约的样本数量为 5104 笔，占总样本的 42%，剩下的 6695 笔交易，没有明确提到是否是口头还是书面合约，但由于书面契约在案件判决中起到的作用很大，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些不明确的样本，以口头合约为主。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熟人间口头合约的效率并不高。

在信用方式方面，纯粹是个人信用借贷的交易数为 7995 笔，占比为 65.7%，保人担保的数量为 2752 笔，占比为 22.6%，使用动产进行抵押的有 536 件，占比为 4.4%，使用不动产进行抵押的为 880 件，占比为 7.2%，这些信息反映在表 2 中。这表明，绝大多数的交易是基于借贷双方之间的信用交易，既没有第三方担保或财产抵押。这与我们前面提到的借贷交易通常都是发生在“素识无嫌”的熟人之间是一致的。

在借期方面，在 2661 笔有借期信息的题本中，能够明确借期有多少个月的只有 891 个，占总样本的百分比为 7.3%，而这 2661 笔样本中，剩下的近 2/3 者对借期的约定常常是像“麦收后”、“秋收后”、“来春”、“冬初”等这样相对模糊的时期指称。在这 2661 笔样本之外，则还有 9197 笔题本没有涉及到借期的信息。民国时期的调查者认为农户在借贷交易中模糊借期是因“时间观念淡薄”^③，对此更有可能的解释或许是彭凯翔等认为的“借期的模糊更应该是缺乏投

① 其律文为“凡私放钱债及与当财物，每月取利不得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法律出版社，1999 年，第 263 页。

② 当然，“零利率”并不等于借贷是无偿的，很多情况下，利息实际上是隐含的，对“零利率”这一特殊现象的专门研究，可参见李楠：“社会网络、连锁合约与风险规避：近代中国乡村无息借款选择行为的实证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 年第 3 期；Loren Brandt and Arthur J. Hosios, “Interest Free Loans Among Villager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8 (2) (2010), 345–372.

③ 四川省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四川省农业金融》欧阳蕢编，《四川省农村经济调查报告》第 4 号，1941 年，第 63 页。

资机会和投资报酬率低的表现—想想当时窖藏仍那么普遍。”^①

由于借期的模糊，我们很难对借贷时间的长短进行统计，但我们可以使用命案发生的年份与借贷交易发生的年份来做一个大致的判断，在大多数情况下，案发时间都是在借贷期满之后。基于此，我们使用案发年份与借贷交易发生的年份之差来度量借期的长短，基于表 2 可知，在 12163 个样本中，命案发生在借贷交易当年的借贷交易为 7810 起，占到总样本数量的 66.4%，而发生在交易之后一年的命案数量为 2691 笔，占比为 22.9%，交易发生之后两年的样本数为 528 笔，占比为 4.5%，上述三者合计 93.7%。这表明这些题本中绝大多数的债务交易都是非常短期的交易。

表 2 合约类型、信用方式、借期的描述统计

(1) 合约类型			(2) 信用方式			(3) 是否约定借期			(4) 案发与交易时间差		
类型	样本	%	类型	样本	%	类型	样本	%	类型	样本	%
口头	5104	42.0	个人信用	7995	65.7	有且明确	857	7.2	当年	7810	66.4
书面	364	3.0	保人	2752	22.6	有且不明确	1720	14.6	后一年	2691	22.9
未详	6595	55.0	动产抵押	536	4.4	不详	9197	78.2	后两年	528	4.5
			不动产	880	7.2				不详	735	6.3
总计	12163	100	总计	12163	100	总计	12163	100	总计	12163	100

注：信用方式中的保人是指需要承担连带债务的人，即若借方不还债，贷方可以向保人索要。案发与交易时间差是用命案发生时的年份减去借贷交易发生时的年份。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对 12163 笔命案所涉及的借贷交易特征做一归纳，这些借贷的主体是借贷本金小、利率为零的口头借贷，且对于借期没有特别明确规定的短期借贷。

对这批债务样本有了较为宏观的认识之后，我们接着分析借贷契约执行方面的特征。在我们关注的样本中，契约的执行主要分为三种，一是贷方自己执行，即贷方自己向借方讨债，二是通过中人、保人来执行，三是通过司法来执行。除此之外，有不少借贷发生在亲朋熟人之间，无形中也是借助这些人际关系来执行，即使自己索讨，常常也有其他亲朋在场。另外，对于清朝当时商业、金融业的契约执行，同业规制、集体惩罚等机制起了很大作用，但这里所列举的主要是日常私人借贷，所以比较简单。

本文收集的案件中，大量的执行主要还是依靠债权人自己进行追讨，超过 95% 的案件是由贷方自己来讨要债务。依靠中人、保人和司法来执行的债务交易比例非常低，中人、保人参与债务执行的比例大约为 2%，而在命案发生之前，借贷双方通过打官司来解决纠纷的比例大概为 1%。

在贷方自己执行的情况下，我们来看借方和贷方在暴力中杀人和丧命的情况，从表 3 可知，在所考察的 12163 笔命案中，借方是凶手的比例占到 40%，而贷方是凶手的比例则为 55.5%，而遇害方则差不多是反过来的，即借方占比为 54.4%，贷方占比为 40.3%，总的来说，在债务命案中贷方打死借方的比例要略高于借方打死贷方的比例。在笔者已发表的一篇文章中^②，对利率明确的刑科题本命案进行了讨论，发现在零利率的情况下，借方打死贷方的比例要远远低于贷方打死借方的比例，而高利贷的情况下，结果却是相反。我们认为“道义”观念在其中起到很大的作用。这一分析在此也仍然是适用的，考虑到大量的借贷都是无息借贷，且屡索无偿，这时贷方使用暴力的倾向性会大于借方，而借方由于常常处于理亏的状态，暴力倾向性会较弱，但当利率超过法律和习俗的规定时，借方的暴力倾向要远高于贷方。

① 陈志武、袁为鹏、彭凯翔、曹辉宁：《“水浅而舟重”：近代中国农村借贷中的市场机制》，《中国工商业、金融史的传统与变迁—十至二十世纪中国工商业、金融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7 年，第 131 页。

② 陈志武、林展、彭凯翔：《民间借贷中的暴力冲突：清代债务命案研究》。

表 3 命案凶手、遇害方、有无诉讼、讨债次数的描述统计

(1) 命案凶手			(2) 命案遇害方			(3) 命案发生前有无诉讼			(4) 讨债次数		
类型	样本	%	类型	样本	%	类型	样本	%	类型	样本	%
借方	4854	40	借方	6611	54. 4	无	12044	99	1 次	4031	33. 1
贷方	6752	55. 5	贷方	4904	40. 3	有	119	1	2 次	660	5. 4
中人、保人	133	1. 1	中人、保人	122	1				3 次及以上	6094	50. 1
其它	424	3. 5	其它	526	4. 3				未详	1378	11. 3
总计	12163	100	总计	12163	100	总计	12163	100	总计	12163	100

中人、保人参与执行的情况也很少，这首先当然是这些借贷交易在达成之前，本身就没有中人、保人，而如果中人、保人能够起到作用，那么这些交易纠纷不至于酿成命案，从而不会出现在刑科题本之中。对于这里使用的 12163 件命案，我们统计了命案的凶手和死者，从这一统计信息，我们可以了解中人、保人在这中间所起到的作用。根据我们的统计，在这些命案中，中人、保人是凶手的案例是 133 件，而中人、保人是遇害方的案件是 122 件，占比都在 1% 左右。我们可以看到，中人、保人确实是会牵涉到借贷交易纠纷之中，这与黄宗智根据地方档案的观察是类似的，只是，这里的中人、保人实际上也出现在非正式的借贷交易之中。中人、保人所起到的作用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情况下是借方不还钱，贷方向中人、保人索要，中人、保人去向借方讨债，与借方发生冲突，将借方打死或被借方打死，第二种情况是借方不还钱，贷方向中人、保人讨债，中人、保人与贷方直接发生冲突，将贷方打死或被贷方打死。在 133 件案件中，中人、保人打死借方的案件是 61 件，保人打死贷方的案件是 66 件。中人、保人被借方打死的案件是 61 件，被贷方打死的是 54 件。所以，答应做中人、保人实际上是一项风险不低的行为，特别是在没有利益补偿的情况下，这不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下面是一件保人参与契约执行的案例。

案例 3：据（贷方、凶犯）黎应湘供，年五十三岁，（湖南）邵阳县人，父母俱故，弟兄三人，小的居长，娶妻康氏，生有四子，与刘得柳素识无嫌，道光二十年，有伍尔辅借欠小的钱二十千文，立有借券，二十三年五月初间，伍尔辅归还钱十九千四百文，余钱央刘得柳担认，约俟五月底清还，……，六月初八日，小的路遇刘得柳，向索钱文，刘得柳要俟伍尔辅外归清给，小的不允，争闹，刘得柳……，到十一日身死。^①

在全部样本中，在命案发生之前，有过司法诉讼的借贷交易的数量为 119 件，占比只有 1%。而这一比重在步德茂讨论的 630 件与土地产权相关的命案中，比例是 14%。^②

为了说明契约执行的困难程度，我们也统计了贷方索债的次数。对于那些在题本中写道“屡索无偿”的样本，我们统一算作 3 次，在 12163 笔信息明确的样本中，第一次讨债就发生命案的样本为 4031 笔，占比为 33.1%，第二次讨债发生命案的样本数量为 660 笔，占比为 5.4%，而第三次或超过三次讨债发生命案的样本数量为 6094 笔，占比为 50.1%。讨债次数不明确的样本数量为 1378 笔，占比为 11.3%。从讨债三次及以上的情况所占的高比重，我们可以知道民间借贷中合约执行的困难。

上面的分析将乾隆样本和道光样本当作一个整体进行分析，没有考虑到时间的变化。表 4 和表 5 将上面讨论的借贷交易的特征分为两个时期单独呈现出来。表 4 的信息表明，从本金和利率的中位数和均值看，两个时期没有大的变化，借款的金额都很小，而大多数利率也都是零利率。

① 档案号：02-01-07-11727-022，题名“题为审理邵阳县民黎应湘因索欠纠纷伤毙刘得柳一案依律拟绞监候请旨事”，具题日期：道光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② 步德茂：《诉讼、合法性即致命性暴力—19 世纪中国乡村法庭无法阻止财产性暴力纠纷之原因》，载曾小萍、欧中坦、加德拉编，李超等译：《早期近代中国的契约与产权》，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年。

表 4 本金和利率在时间上的变化

变量名称	时期	观测值	中位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本金（银两）	乾隆 31－40 年	4647	0.5	5.1	101.3	0.0011	6574.4
本金（银两）	道光 16—25 年	6555	0.6	4.9	30.6	0.0007	1520.0
利率（%）	乾隆 31—40 年	2061	0	7.8	77.2	0	3272.7
利率（%）	道光 16—25 年	1776	0	9.3	141.4	0	4500.0

注：这里的本金变化如果换算为粮食价值，变化也不大，因为在考察的这两个十年当中，道光十年相对于乾隆十年米价约上涨 32%，而本金中位数则增加了 20%。^①

表 5 的信息则表明，除了讨债次数，其它借贷交易的特征并没有实质性变化，大部分的借期都是在一年以内，有诉讼的百分比都低于 2%，而书面合约的占比都低于 4%，约定了借期的交易数量大概占 20% 左右，而有明确借期的则都不超过 10%。总的案件量方面，道光朝的案件数量比乾隆朝要多两千件，这与这一时期整个命案呈现上升趋势是一致的，但从人均的案件数量看，变化则不大。唯一变化较大的是讨债次数，相对于乾隆朝，道光朝讨债次数在两次以上的比重增加了 20 个百分点。

表 5 其它交易特征在时间上的变化

时期	总的 案件 数量	人均案件 (件/十万人)	借期在 一年以内 (%)	讨债次数 2 次及以上 (%)	案发前 有诉讼 (%)	书面 合约占比 (%)	约定 借期 (%)	借期 明确 (%)	借方死亡 占比 (%)
乾隆	5051	169.4	86.7	43.2	1.7	3.8	20.5	9.5	50.8
道光	7112	173.6	89.5	64.4	0.5	2.2	23	5.8	56.9

注：同期人口根据曹树基的估计^②，不包括内蒙古、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黑龙江。采用每十年一期，进行线性插值，得到乾隆十年的人口数为 29820 万，道光十年的人口为 40969 万。

另外，就这里讨论的时期，我们发现，各个省份之间的差异也是非常小的，上面对于样本总体的描述基本也适合于对各个省在两个时期的描述。限于篇幅，这些借贷交易在省一级上面的差异没有通过表格列出来。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乾隆中期和道光中后期刑科题本债务命案的基本特征。首先，在债务契约的订立方面，这些借贷交易绝大多数是发生在熟人之间的小额无息借贷，对借期一般没有明确的约定，且借期一般较短。其次，在契约的执行方面，主要包括三种执行方式，其中一种是贷方自己去索欠，这是最为主要的，大部分契约的执行都是靠贷方自己去索要欠债，由于这些借贷交易的非正式性，保人参与的比例本身就较低，因此，这些交易中中人、保人卷入命案的比例也非常低，除此之外，依靠诉讼来解决债务纠纷的尝试所占的比例也很低。

三、契约模糊性与债务命案

刑科题本中的债务命案数量众多，对其成因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文明演进的历史。当然，导致命案因素非常多，比如是否受到灾荒等生存挑战，市场特别是借贷市场的发达程度，还有上文提到的“道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诱因，比如，在借贷双方在产生纠纷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薄情”等类似的指责。完整地分析债务命案成因需要收集更多其它社会经济信息，我们计划另行撰文来讨论。本文的目的在于考察上述借贷交易中明显存在的模糊性特征，讨论契约模糊性对债务纠纷和命案的影响。

① 米价指数来自于彭凯翔：《清代以来的粮价：历史学的解释与再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71—173 页。

②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703、704 页。

“模糊”是相对于“明确”或“确定”而言，我们在这里比较宽泛地使用契约模糊性这一概念^①，这一概念在契约经济学中与不完全合约理论有很大的关联，就这里的目的而言，契约模糊性更多是表述下面这一类现象。即借贷交易双方在订立借贷合约或合约再谈判时，对于合约中的一些条款没有做出明确的约定，使得契约执行时双方对合约条款产生不同的认识。

黄宗智在对满铁和清末民国地方司法档案进行研究时^②，尽管没有明确提出“模糊性”概念，但已经注意到契约模糊性对于借贷冲突和诉讼带来的影响，其将借贷类型分为正式借贷和非正式借贷两类。这里契约的模糊性与确定性，与黄宗智所划分的正式借贷和非正式借贷有相通之处，一般来说，正式借贷不仅有中人、保人，还有字据等书面契约，因此模糊性较低，而非正式借贷则常常没有上述契约要件，使得模糊性提高。但是，契约的模糊性所涵盖的范围要超过非正式借贷，即使在正式借贷中，也会产生契约模糊性，进而引发纠纷和命案。

基于本文收集的样本，我们主要考察下面两类在题本中比较多见的模糊性情况，一类是借期的模糊性，另外是利息的模糊性。借期的模糊性主要分为三种情形，一是没有明确归还的借期，这常常会导致前文分析的“屡索无偿”的情况发生，在这一情况下，贷方由于多次讨债无果，往往容易使用暴力来进行追讨。

二是有借期，但没有约定逾期应该如何处理，这时也常常是涉及到逾期是否加利的争论，比如下面的案例4。

案例4：凶犯（借方）傅正弼供：（四川成都）华阳县人，年四十五岁，与罗登仲素识没仇。道光十五年五月初十日，小的拿蓝布衫一件押借罗登仲钱一百五十文。原约三日内赎回，不加利钱。十四日傍晚小的拿钱去向罗登仲赎衣。罗登仲说已过三日，要加利钱二十文，小的央让。罗登仲不肯。小的斥他薄情。罗登仲随口混骂。小的回骂。……。并没有心致死。（判决）傅正弼衣服仍令照常赎回。^③

三是有借期，但没有约定贷方是否可以提前要求借方偿还。案例5显示的正是这一情形。

案例5：凶犯（借方）刘五收，籍隶山东郅城县，与薛自新同庄，无嫌。道光二十三年九月间，刘五收因欠钱使用，央刘广处作保，借用薛自新大钱五千文，约定十二月归还，十一月二十五日，薛自新往向刘五收索讨前欠，刘五收因期约未至，又无钱文，央恳暂缓。薛自新不依，辱骂，声言刘五收卖妻亦得还钱。……。（判决）所欠薛自新钱照数追给。^④

利息不明确的情况要更加多样，下面分别举例说明。

一是双方在借贷交易开始时，并没有约定利息，借方认为没有利息，而贷方则认为有利息，且贷方要求的利息常常较高。比如下面的案例6中，借方周立宽以为没有利息，贷方罗汶斗索要的利息则非常高，由于借期只有一天，如果转化为年利率，则高达9000%。^⑤这也提醒我们，在理解利率信息时，需要结合更多的合约条款来进行分析，单独讨论利率的高低，不仅不能够正确认识民间借贷的特征，还可能会产生错误的认识。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是借贷契约各种影响因素综合的反映。

案例6：据凶犯（借方）周立宽供，小的是（四川成都府）彭县人，年四十一岁，父母俱

① 与这里讨论的模糊性相关的另外一个概念是合约的不完全性，这一概念是指由于事前无法预测到的情况，导致合约没有办法做详细的规定，详细地讨论这一概念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② 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33—34页。

③ 档案号：02-01-07-11240-003，题名“题为会审川省华阳县民傅正弼因赎回布衫加利纠纷伤毙罗登仲案依律拟绞监候请旨事”，具题日期：道光十六年三月十八日。

④ 档案号：02-01-07-11852-004，题名“题为会审山东郅城县案犯刘五收遭索殴毙薛自新案依律拟绞监候请旨事”，具题日期：道光二十五年四月二十日。

⑤ 因为该笔借贷实际上只有一天的时间，则年利率则需要按照一个月30天，一年12个月进行换算，即将日利率乘以360。这里日利率的计算方式为（30文/120文）*100%=25%。

故，并没弟兄妻室，与罗汶斗素识没仇。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三日，小的因有急用把蓝布棉袄一件向罗汶斗抵押钱一百二十文使用。初四日下午，小的拿钱往向罗汶斗赎回棉袄，罗汶斗要加利钱三十文，小的不肯。……，到傍晚，罗汶斗因伤死了，并不是有心致死，也没起衅别，是实。（判决）周立宽棉袄饬令赎回，其抵押仅止一日且未言定加利，免其著追。^①

二是双方没有约定利息，但是借贷双方都默认需要给利息，只是在合约执行时，借方是按照一个较低的利息归还，而贷方则要求更高的利息，双方由于对事前预期的利息多少不一致，导致交易产生纠纷，进而酿成命案，在下文的案例7中，借方刘四子按照月息六分（6%）多归还欠款，但贷方却要求按月加一起息（10%）。即使是按月6%计息，也已经超过《大清律例》月息3%的规定，因此，官方的判决认为贷方“路全小子违禁取利，律应治罪并追余利给主”，但因为“已经身死”，“应免议追”。

案例7：凶犯（借方）刘四子供，小的年二十五岁，本县（山西交城县）底村人，与路全小子同村居住，并没嫌隙。乾隆三十七年四月，小的借用路全小子三百文钱，到三十八年正月陆续还过五百文，已有六分多利息，他还常向小的讨钱，二月十一日晚，小的到他铺里问他怎样算账，他说每月要三十文利钱，……。小的说你从前不曾说过要加一起息，……，（判决）路全小子违禁取利，律应治罪并追余利给主，已经身死，应免议追。^②

三是在以劳务归还利息的情况下，劳动价格发生波动。在案例8中，借方李牛子在不是农忙的二月里向赵小汉借钱，答应锄地一日抵债，但赵小汉要求李牛子履行约定的时候，已经是农忙的5月，锄地一日的工资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时李牛子不再愿意按照事前的约定履行债务，导致纠纷和命案。

案例8：据凶犯（借方）李牛子供：小的是（山西朔平府）马邑县西河底村民，今年二十岁了，父亲李茂芬，今年六十八岁，母亲杨氏，今年六十四岁，并没弟兄妻子。与赵小汉同村居住，平日并没嫌隙。本年二月里，小的因没钱使用，原向赵小汉借了十八文钱，说过替他锄地一日抵算。本月（该年5月）十六日傍晚，小的在街上撞见他，他叫小的第二日与他锄地抵算借钱。小的说如今正在农忙，每日都是五十个工钱，我只借你十八个钱，如何叫我锄一日地呢？他说小的反悔，就骂起来。……。并不是有心要掷死他的。（判决）仍于李牛子名下，照追所欠钱文……。^③

四是货币价值变化。在清朝，金属货币的币值本身会发生变化，比如银钱比价的变动，在案例9中，借方方阿房借番银还铜钱，由于番银与铜钱的比价发生变化，贷方方阿集和方阿益要求方阿房按照借钱时的番银－铜钱比价归还铜钱，而方阿房则只愿按照还钱当时的比价来归还，进而导致争执和命案。

案例9：据（凶犯、贷方）方阿集供：小的同堂哥子方阿益合伙开钱店，与方阿强、方阿房鞋店时常交易。本年正月内，方阿房到小的店里取去番银三十圆，那时银价每圆换钱六百三十文。方阿房陆续还过铜钱一十八千六百文，尚欠钱三百文。四月十四日，堂哥子方阿益到方阿房鞋店取讨，方阿房说照依现在时价，每圆换钱六百二十文，已经清结，不肯照给，哥子与他争

① 档案号：02-01-07-11504-002，题名“题为审理彭县民周立宽因赎衣拒加利钱起衅伤毙罗汶斗等情一案依律拟绞监候请旨事”。具题日期：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二日。情形类似的案例还有02-01-07-06264-002，“题为审理江油县民强维官因被索欠起衅伤毙梁朝一案依律拟绞监候请旨事”等。具题日期：乾隆三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② 档案号：02-01-07-06855-012，题名“题为会审山西交城县民刘四子因被加索利钱扎伤路全小子身死一案依律拟绞监候请旨事”，具题日期：乾隆三十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③ 档案号：02-01-07-06163-014，题名“题为审理马邑县民李牛子因被令锄地抵欠伤毙债主赵小汉案依律拟绞监候请旨事”，具题日期：乾隆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闹，经铺邻劝散。^①

五是已经说好让去利息，后来贷方又索要。比如下面的案例 10 中，贷方张大全答应让去利息，但一个多月后，看到借方手上拿着钱，又开始索要，进而引发冲突。而官方的判决也是支持张大全已经“情让”这一决定。

案例 10：据（凶犯，借方）万洪迁供：（四川）眉州人年二十一岁，与张大全素识没嫌。道光十四年三月初四日，小的借用张大全钱十五千文，立有约据。十一月十二日小的因该债账，把田业出卖清还，又因所得业价不够还债，央恳各债主酌量请让，原欠张大全钱文说明之还钱十二千五百文，张大全应允，把钱收去，退还借约。十二月二十九日小的到将军庙赶场，……，撞遇张大全走来，见小的拿有钱文，说他前曾让过小的钱二千五百文，他现有急用，叫小的把钱给他应急，小的不肯，张大全斥说薄情，……，到一更后张大全就因伤死了，并没有心致死。（判决）万洪迁短还张大全欠项，系张大全自愿情让，应免着追。^②

上述案例说明了契约模糊种类的多样性，当然肯定会遗漏掉很多其它模糊性的类型，比如对于本金价值变化的约定、相互借贷时利息如何计算等。但根据上面的案例，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在合约达成或重新缔结时对借期和利息计算方式没有进行明确约定，是引发纠纷和命案的重要诱因。

四、结 论

基于对乾隆 31 至 40 年、道光 16 至 25 年这 20 年间的刑科题本债务命案的量化分析，我们发现，这些题本中的债务交易呈现出如下的特征。在契约订立方面，这些借贷交易主要是发生在熟人之间的小额无息借贷，交易双方一般没有签订书面的契约，也很少有保人或财产抵押，借期通常没有明确的规定且主要是短期交易。在契约的执行方面，主要以贷方自己执行为主，中人、保人参与协调纠纷以及诉诸司法的案例非常少，且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上述特征在所考察的两个时间段内，没有显著的变化，且在省级区域上面的差异和时间变化都较小。需要补充的是，在这里的命案样本中极少有商人间的大宗往来或金融机构的放贷（而巴县档案等非命案样本中这些情况则相对较多），所以这里的样本很难反映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借贷交易关系。

我们的研究从两个方面丰富了现有的文献，一是在对借贷契约的执行方面，我们认为，以往过于强调契约订立以及从高利贷角度理解民间借贷的研究是不全面的，以往研究所认为的传统社会基于道义和善意的无息借贷，并没有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温情脉脉，相对于采用正式契约且规定明确的借贷，如果考虑到无息借贷可能引发的潜在纠纷、暴力和命案的风险，无息借贷可能是一种更加“昂贵”的借贷交易。

二是在理解命案的原因方面，通过考察模糊性与命案的联系，表明书面契约是减少交易纠纷的重要方式，也是减少暴力冲突、促长文明的做法。不过由于我们用的是产生了命案的借贷样本，而不是整个社会的借贷交易全样本，这里的结论仍然是非常初步的，但根据已有的案例分析，我们至少可以推断，契约模糊性是引发债务纠纷和命案的重要诱因。

对上述清代债务命案的考察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非人格化的正规金融市场存在的价值，现代金融市场通过提供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和明确的交易契约，缓解了人们的现金流压力，进而帮助减少了可能会发生的交易纠纷。另外，通过引入书面契约、信用评估、法庭裁判和执行等方式，从而使得人们使用暴力来执行契约的必要性大大下降。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的发展，通过契

① 档案号：02-01-07-06250-003，题名“”，具题日期：

② 档案号：02-01-07-11216-015，题名“题为会审川省眉州民人万洪迁因索欠纠纷殴毙张大全案依律拟绞监候请旨事”，具题日期：道光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约化和要求与借贷风险相适应的利息回报，看似是增加了借方的负担，但却减少了暴力的诱因，成为推动了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主要参考文献

[1] 步德茂著, 张世明、刘亚丛、陈兆肆译, 2008: 《过失杀人、市场与道德经济: 18 世纪中国财产权的暴力纠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 陈志武、林展、彭凯翔: 《民间借贷中的暴力冲突: 清代债务命案研究》, 《经济研究》, 2014 年第 9 期。

[3] 斯蒂芬·平克, 安雯译: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 暴力为什么会下降》, 中信出版社, 2015 年。

[4] 曾小萍、欧中坦、加德拉编, 李超等译: 《早期近代中国的契约与产权》,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年。Z

Research on Debt Homicide Cases in mid Qianlong and mid-late Daoguang Reigns

LIN Zhan, CHEN Zhiwu, PENG Kaixia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zhan. lin@ruc. edu. cn; Yale University and Peking University; Henan University)

Using a sample of 12163 debt homicide cases for 1766 – 1775 and 1836 – 1845, collected from homicide reports of Qing Dynasty (XIN KE TI BE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bt contracts formation and execution. We find that, on the formation side, these contracts are mostly made orally, with relative small capital amount, lots of zero-interest rate loans and short and often not clear loan period, and usually without collateral or guarantors. On the execution side, most deals are executed by lenders themselves, guarantors are rarely involved in resolving disputes, and very few disputes are submitted to court. These lending transactions display a remarkable feature of vagueness. By listing several cases, we find that this kind of vagueness is one of important causes of violence.